

《曹子建集》宋嘉定六年本证伪

——曹植集版本系统新证

时 鹏 飞

内容摘要:迄今为止,除去所谓宋开宝七年刻本等赝本,流传有绪、信而有征的宋本《曹子建集》,只有上海图书馆所藏宋刻本和清《四库全书》本《曹子建集》底本所出的所谓宋嘉定六年刻本两种。但是,根据《四库全书考证》所反映《四库全书》底本面貌,以及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明舒贞刻本、明郭云鹏刻本、《四库全书》本《曹子建集》篇目文字等来看,所谓宋嘉定六年刻本与所谓宋开宝七年刻本一样,都是明嘉靖郭云鹏刻本伪托。证伪所谓宋嘉定六年本,另外重新比对明活字本、舒贞刻本、郭云鹏本、《四库全书》本等篇目文字异同,不难发现,既有种种说法尽管都十分富有洞见,但是曹植集版本系统仍然有重新梳理的必要。

关键词:《曹子建集》 宋本 辨伪 郭云鹏本 《四库全书》本

与文学创作的烜赫声名形成对比的是,曹植集在唐宋就湮没不传,传世各本曹植集都是由后人重新辑佚编纂而来。宋人首开辑佚曹植集之端,有线索可寻的宋刻本,过去认为有四种^①。其中北宋开宝刻本之说,建立在李盛铎木犀轩旧藏明翻宋开宝七年刻本之上,不过该翻刻本据比对其实是利用明嘉靖郭云鹏刻本伪托^②,因此不足为据。至于北宋元丰五年刻本,著录于《天禄琳琅书目》,但是实物无传,今亦莫可究诂。因此,学界通常认为,曹植集真实可靠、有线索可寻的宋本,只有今藏上海图书馆的南宋宁宗时刻本(以下简称“上图本”)^③与《四库全书》本底本渊源所自的所谓南宋宁宗嘉定

①朴现圭:《曹植集编纂过程与四种宋版之分析》,《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第27-32页。

②蔡敏敏:《四种宋本曹植集之分析》,《中国学研究》第12辑,济南出版社,2009年,第205页。

③朴现圭认为该本为宋孝宗时刻本(《曹植集编纂过程与四种宋本之分析》,第30-31页),但是根据避讳来看,该本为宋宁宗时刻本(蔡敏敏:《曹植诗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5页)。

六年刻本(以下简称“嘉定本”,尽管都是宋宁宗时刻本,但是彼此互异,并非一本)。不过笔者根据种种线索分析,后者其实也是利用明嘉靖郭云鹏刻本伪托。考证该本真伪,不但有助于还原宋代曹植集真实面貌,而且有助于重新梳理由宋至清诸本曹植集的版本系统与源流。

一、曹植集在唐宋的流传情况

近年来,关于曹植集版本又有不少讨论与争鸣,很多问题尚未取得一致意见。首先是宋本曹植集与唐本关系的问题。《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魏陈思王集》二十卷,又三十卷”^①,其中三十卷本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曹植集卷帙一样,当为同一版本。该著录证明《旧唐书·经籍志》所依据的开元时期《古今书录》著录有二十卷和三十卷两个版本,也就是开元时期官方藏书有二十卷与三十卷两个版本。《新唐书·艺文志》也著录“《陈思王集》二十卷,又三十卷”^②,由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部分与《旧唐书·经籍志》同样是根据《古今书录》(《古今书录》之外,《新唐书·艺文志》还采用唐代韦述《集贤书目》等加以增补),那么《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也仅仅证明开元时期有二十卷本与三十卷本,并未提供其他信息。近年来学者又提出一条证据,期于证明北宋秘阁藏有曹植集:

北宋秘阁藏有曹植集,按《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有《陈思王集》一目,宋李廷允《太平御览跋》称:“《御览》一书皆纂辑百氏要言……多人间未见之书。”而此后纂修的《崇文总目》已不见著录,印证作为秘阁藏本的曹植集似散佚于北宋中期。^③

其实,正如聂崇岐在民国时期指出的,《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以下简称“《纲目》”)并不是《太平御览》编纂时的征引书目:

《御览》首卷之前,宋以来即附有《经史图书纲目》,详载引用诸书。《纲目》之作,当在何时,后世颇少定论;惟其中并列《唐书》及《旧唐书》之名,则颇使人疑其非修书时所拟进,乃仁宗以后好事者所撰辑者。盖修《御览》时,《唐书》仅有刘昫所修一种,初无旧与新之别;至仁宗嘉祐五年欧阳修等重修《唐书》成,刘书始被冠以“旧”字,而欧书或冠“新”字,或直称《唐书》也。^④

《纲目》著录一千六百九十种图书,“外有古律诗、古赋、铭、箴、杂书等类,不

①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2053页。

②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579页。

③刘明:《宋本〈曹子建文集〉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2期,第15页。

④聂崇岐:《太平御览引得序》,《太平御览引得》卷首,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第7页。

及具录”^①。但是,却没有著录《太平御览》最重要的文献来源——《修文殿御览》等同样性质的类书^②,即此,就可以证明《纲目》绝非“修书时所拟进”。事实上,《纲目》是后人根据《太平御览》里征引的图书重新整理出来的《太平御览》征引目录^③。因此,“《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有《陈思王集》一目”,也并不证明北宋秘阁藏有曹植集。

南宋著录的曹植集,一种是陈振孙见到的二十卷本:

《陈思王集》二十卷。魏陈思王曹植子建撰,卷数与前志合,其间亦有采取《御览》《书钞》《类聚》诸书中所有者,意皆后人附益,然则亦非当时全书矣!其间间或引挚虞《流别集》。此书国初已亡,犹是唐人旧传也。^④

这种征引挚虞《文章流别集》的二十卷本,应当出自唐本,而宋人又有缀辑,但因后来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因此不再赘述。

另一种是晁公武见到的十卷本:

《曹植集》十卷。右魏曹植子建也……按《魏志》:“景初中,撰录植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隋志》植集三十卷,《唐志》植集二十卷。今集十卷,比隋、唐本有亡逸者,而诗文二百篇,返溢于本传所载,不晓其故。^⑤

这种“诗文二百篇”的十卷本,卷数与篇数都与上图本《曹子建文集》一致,一

①《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太平御览》卷首,中华书局,1959年,第20页。

②《太平御览》卷首:“帝阅前代类书门目纷杂,失其伦次,遂诏修此书,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分定门目,八年十二月书成。”(《太平御览》卷首,第3页)

③周生杰举出十三种见于《纲目》、不见于《太平御览》的图书,并认为《纲目》编者“其参考的或者还有其他书目也未可知”(周生杰:《〈太平御览〉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第156页)。但是,根据笔者重新检核,十三种图书都见于《太平御览》,也就是说《纲目》著录一千六百九十种图书都见于《太平御览》正文。其中有一些图书,比如《立后土国语》《讽谏木国语》《见君大韩子》《台甲孔丛子》《杀谏庚符子》,其实是《国语》《韩子》《孔丛子》《符子》之误,“立后”“讽谏”“见君”“台”是引文内容的梗概,“土”“木”“甲”“庚”应当是史源文献的节目次序标识(郭伯恭:《宋四大书考》,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30页),其说甚是。

④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題》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62页。

⑤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10-811页。

般被认为是上图本及诸明本的祖本。关于上图本,一种新近的看法是认为该本出于唐本:

按目录第二叶a面和卷二第六叶b面两处之“愍志赋”之“愍”字阙笔,与国家图书馆藏五代北宋初刻本《弥勒下生经》“愍”字同……这意味着宋本曹植集保留了唐本(或部分)面貌。^①

但是,“愍”字写作“愍”^②,并非因避讳而阙笔,后者其实是前者的俗写。苏轼行书《送寿圣聪长老偈》“愍”字即写作“愍”^③。该说尤其不能解释的一个问题是,上图本《曹子建文集》收录的诗文,无一例外地见于《文选》《艺文类聚》《乐府诗集》等^④,没有一首溢出以上范围。尤其是作为类书,《艺文类聚》收录曹植诗文往往有删节,而上图本《曹子建文集》与《艺文类聚》重复百篇左右,除去部分诗文见于《文选》等书因此比较完整,其他基本上完全同于《艺文类聚》收录的删节之本。由此可证,上图本是宋人根据《文选》等书辑佚,重新编纂而成,而非唐本。

二、南宋“嘉定六年”本辨伪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曹子建集》提要说:

此本目录后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犹从宋宁宗时本翻雕,盖即《通考》所载也。凡赋四十四篇、诗七十四篇、杂文九十二篇。合计之,得二百十篇。^⑤

由于宋嘉定本与明翻嘉定本都片纸无存,因此分析嘉定本,其根据不外乎就是《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本”)。但是,笔者首先要强调的是,四库本与其底本并不完全相同。四库本在誊写过程中曾经大规模参照张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以下简称“《百三家集》”)校勘并改动其底本,改动过程保存在《四库全书考证》(以下简称“《考证》”)中(《考证》保留的四库馆臣的十条《曹子建集》校勘记,除去一条是根据《三国志》之外,其余九条都是根据《百三家集》校改,因此可以认为《百三家集》是四库馆臣校勘的主要依据)。但是由于《考证》并不是校勘记的全部,因此四库本没有校勘记的文字也并不反映四库底本的原貌。但是《考证》中关于“刊本”作某某的记载,

①刘明:《宋本〈曹子建集〉考论》,第15页。

②曹植:《宋本曹子建文集》卷首《曹子建文集目录》,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涵芬楼影印《续古逸丛书》本。

③上海书学会编:《行草大字典》,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1138页。

④蔡敏敏:《曹植诗赋研究》,第30页。

⑤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别集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第1273页。

却必然准确地反映四库底本的面貌,比如:

《致司马仲达书》“今贼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区区之吴尔,无有争雄于宇内、角胜于平原之志也”,刊本“守区区之吴尔”六字讹作“守欧吴耳”四字,又脱“内”字,并据《百三家集》改增。^①

由此可知,四库本底本此处讹误文字原为“今贼徒欲保江表之城,守欧吴尔,无有争雄于宇、角胜于平原之志也”。经比对可知,该条错误文字虽然与上图本不同,但是却与明嘉靖郭云鹏刻本完全一样。进一步考察,《考证》十条校勘记,其反映的底本文字面貌,都与郭云鹏本完全一样,仅有条不同:

《班婕妤赞》:“盈冲其骄,穷其厌悦,在《夷》艰贞,在《晋》三接”,刊本“悦”讹在“穷”字上,又“夷艰”讹作“汉夷”,并据《百三家集》改。^②

郭云鹏本作:

盈冲其骄,穷悦其厌,汉《夷》艰贞,在《晋》正接。^③

《周易·晋卦》说“昼日三接”,“三”字当系馆臣理校。《考证》说底本“‘悦’字讹在‘穷’字上”,郭云鹏本却是“悦”讹在“穷”字下,由于其他九条校勘记反映的底本面貌都与郭云鹏本一致,有理由相信这里“上”字当系馆臣笔误。凡此,足可证明四库底本在版本源流上与郭云鹏本必然有着紧密联系。倘若四库底本与郭云鹏本作为不同版本系统的两个刻本分别出现讹脱衍倒,绝不可能发生九条同样的错误。因此只有两种可能:(1)四库底本即郭云鹏本,底本中“嘉定六年癸酉”系伪托;(2)郭云鹏本与四库底本是同源版本,皆源自嘉定六年本。

但是,从明活字本(根据正德五年舒贞刻本卷首田澜序,舒贞刻本即出于活字本,因此活字本年代应当在正德以前)、明正德五年舒贞刻本与郭云鹏本的关系来看,郭云鹏本绝不可能出自南宋嘉定六年刻本。首先,四库本与郭云鹏本一样,卷三末有《述行赋》,居于赋类之末;卷四末有《七步诗》,居于诗类之末、卷五乐府类之前。倘若郭云鹏本与四库底本都是源自南宋嘉定六年刻本,那么也就是说嘉定本《曹子建集》已经收录有《述行赋》和《七步诗》。但是,正如黄永年指出的是,郭云鹏本与明活字本有着密切联系,“二者不仅行格、款式完全相同,连版心的式样也完全吻合”^④,更具说服力的论证来自蔡敏敏:

①王太岳等:《四库全书考证》卷七四,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②王太岳等:《四库全书考证》卷七四,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③《曹子建集》卷七,明嘉靖郭云鹏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④黄永年:《〈曹子建集〉二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116页。

文字上亦无大异,甚至前文提到的活字本目录中有误的题目,郭本也跟着错。如卷四《鹑雀赋》误作《雀鹑赋》,卷五《侍太子坐》误作《侍太子望》,卷六《梁甫行》《桂之树行》误作《梁甫吟》《桂树枝行》等。^①

大量同样的讹误文字证明,明活字本与郭云鹏本必然属于同一版本系统,倘若郭云鹏本出自于嘉定六年本,那么明活字本势必也属于嘉定本系统。但是,四库本、郭云鹏本与明活字本有一个显著不同,就是明活字本与上图本《曹子建集》一样,没有《述行赋》和《七步诗》。明活字本文字上确实存在脱漏的现象,比如该本正文卷八脱去《初封安乡侯表》与《谢妻改封表》,但是该本目录并没有脱去两篇的篇目(详见第三节),而《述行赋》和《七步诗》,既不见于明活字本的目录,也不见于正文。由此来看,属于相同版本系统的明活字本与郭云鹏本,绝不会出自于宋嘉定六年本。

另外,明正德五年刊刻的舒贞刻本《陈思王集》,据卷首田澜序,是出于明活字本的誉录本,又将卷四诗、卷五乐府移至卷九、卷八,原卷六、七、八、九提前为卷四、五、六、七,但是每卷之内,次序没有变化。在传世各本曹植集当中,舒贞刻本第一次在卷末收录有《述行赋》,小题下注“附,出《古文苑》”^②;在诗类之末收录有《七步诗》,小题下注“附”^③。舒贞刻本的底本明活字本没有的《述行赋》与《七步诗》不但出现在舒贞刻本,而且卷首田澜序说:“《七步诗》散见诸书,《述行赋》出《古文苑》。”由此可见,《述行赋》与《七步诗》是舒贞根据“诸书”与《古文苑》辑佚,并非是根据嘉定本。该判断与以往关于郭云鹏本的判断吻合:

此本与活字本唯一明显的差别在于卷四末有《述行赋》,卷五末有《七步诗》。此外,字句上也微有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与舒贞本极为相似。^④

曹植佚诗佚文散见于群书者不在少数,为什么自嘉定本至明活字本之间脱去的《述行赋》与《七步诗》,恰好与舒贞重新辑佚的两篇一模一样?

综上所述,倘若四库本《曹子建集》底本为宋嘉定六年刻本,那么势必出现如下结果:(1)宋人辑佚重编的《曹子建集》祖本衍生出嘉定本和上图本两个版本,后者脱去《述行赋》和《七步诗》。(2)舒贞翻刻明铜活字本《曹子建集》时,根据《古文苑》辑出《述行赋》,根据“群书”辑出《七步诗》,其所辑两篇文字恰巧与祖本衍生为上图本时所脱篇目完全一样(连舒贞辑出篇目所

①蔡敏敏:《现存明本曹植集概考》,《兰州学刊》2009年第1期,第118页。

②《陈思王集》卷十,明正德五年舒贞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③《陈思王集》卷九,明正德五年舒贞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④蔡敏敏:《现存明本曹植集概考》,第118页。

在位置都与嘉定本一样)。(3)如前所述,嘉定本倘若不是郭云鹏本的伪托,就是郭云鹏本的祖本,郭云鹏本与明活字本属于同一版本系统,那么明活字本应当也出自嘉定本,也就是说,嘉定本衍生为明活字本时,同样脱去《述行赋》和《七步诗》两篇文字。这些巧合同时发生的可能性实在太小。由此分析,郭云鹏本与四库底本的关系,绝不会是郭云鹏本渊源自四库底本,而只能是四库底本“嘉定六年癸酉”的牌记系属后人作伪,四库底本其实就是郭云鹏本。

另外,比对郭云鹏本、《百三家集》本、四库本《曹子建集》文字不难发现,四库本文字与郭云鹏本十分接近。试以卷四为例,根据笔者校勘比对,该卷郭云鹏本与四库本文字异同凡 31 条。但是,四库本主要根据《百三家集》本、次要根据他校或理校改动过底本文字,郭云鹏本与四库本 31 条异文,有 29 条异文与《百三家集》本相同,也就是说,除去来自《百三家集》本的异文,四库本该卷与郭云鹏本仅有 2 条异文,分别是:郭云鹏本《鹦鹉赋》“殊六翮之无遗”,《四库》本“殊”字作“残”字;郭云鹏本《鹞赋》“猛气其斗”,《四库》本作“猛气共斗”。如前所述,宋本《曹子建集》是宋人根据《艺文类聚》等书辑佚编成,2 条异文,郭云鹏本都与宋本《艺文类聚》相同,应当是宋人辑本原始面貌(令人玩味的是,尽管与宋本《艺文类聚》相异,四库本《曹子建集》所收《鹞赋》文字,却与四库本《艺文类聚》文字相同)。不难发现,《鹦鹉赋》《鹞赋》2 条异文,郭云鹏本文字难于索解,因此四库本与之不同,应当是四库本理校。倘若四库本底本翻刻自嘉定本,那么嘉定本与郭云鹏本竟然几乎无一字之异,岂不是咄咄怪事?

《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字也透露出四库本受郭云鹏本影响的痕迹:

凡赋四十四篇、诗七十四篇、杂文九十二篇。合计之,得二百十篇。

较《魏志》所称百余篇者,其数转溢。

郭云鹏本卷首徐伯虬《刻曹子建集序》说:

按景初中植著凡百余篇,隋为三十卷,今卷止十,诗文反溢,而近二百篇。^①

二者用语接近,《四库全书总目》之说,也许就是受郭云鹏本卷首《刻曹子建集序》启发。至于其篇目统计数字与徐伯虬不同,应当是统计方法不同(比如《杂诗》六首计算为一首抑或是六首)。黄永年统计郭云鹏本亦得“郭本赋 44 篇”“郭本诗 74 篇”“杂文,活字本、郭本同为 92 篇”^②,与四库本完全

①徐伯虬:《刻曹子建集序》,《曹子建集》卷首,明嘉靖郭云鹏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②黄永年:《〈曹子建集〉二题》,第 115-116 页。笔者根据国家图书馆藏郭云鹏刻本《曹子建集》所得统计数字与此相同。

相同。王欣夫描述郭云鹏本说：

或以其字迹端凝，疑出覆宋者，非也。此本用黄纸刷印，阔文而坚致，骤视之，俨然宋本。^①

据蔡敏敏考察，所谓“明覆刻宋开宝七年刊本”就是以郭云鹏本伪托覆宋本^②，也可见利用郭云鹏本的特征，伪托为覆宋本并非个案，《四库全书总目》所谓覆刻宋嘉定六年本《曹子建集》也不例外。

三、曹植集版本系统之厘定

黄永年曾经就曹植集的版本系统进行过简单梳理：南宋刻大字本→明许氏活字本→明嘉靖郭云鹏刻本^③。另外认为郭云鹏本可能参考过舒贞本。尽管对该版本系统的讨论十分简单，但是其结论为绝大多数学者采信。黄永年的意见受到瞿镛的启发，瞿镛根据原藏铁琴铜剑楼的上图本与郭云鹏本对比发现：

凡赋四十三篇、诗六十三篇、杂文九十篇，与明嘉靖时郭万程（郭云鹏字）本篇数次第不合。卷四无《述行赋》，卷五无《七步诗》，卷七《班婕妤赞》在《禹妻赞》前，《汉高帝赞》在《巢父赞》前，卷八《谢赐柰表》在《求自试表》前。^④

黄永年又参校明活字本发现：

以活字本对勘，卷7《班婕妤赞》已在《禹妻赞》之后，《汉高帝赞》在《巢父赞》之后，卷8《谢赐柰表》也已在《求自试表》之后。可见首先更易宋本次第的是这个明活字本，郭本仅仅是沿用活字本的次第而已。^⑤

不难发现，考察曹植集版本源流关键就在于卷七、卷八两卷杂文篇目问题。但是黄永年指出的篇目顺序差异，实际上仅仅是上图本、明活字本、郭云鹏本三本目录著录的篇目差异，并不是正文实际的篇目差异，因为明活字本还有目录与正文不吻合的问题。今将上图本、明活字本目录及正文、郭云鹏本卷八异同篇目罗列于下，舒贞本对卷次有改动，但是每卷之内篇次没有改动，这里移录其目录及正文对应卷次篇目，四库本情况更为复杂，列于最后。如下表所示：

①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06页。

②蔡敏敏：《四种宋本曹植集之分析》，第205页。

③黄永年：《〈曹子建集〉二题》，第118页。

④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清常熟瞿氏家塾刻本。

⑤黄永年：《〈曹子建集〉二题》，第117页。

上图本	明活字本 目录	明活字本 正文	舒贞本 目录	舒贞本 正文	郭云鹏本	四库本
改封陈王 谢恩章	改封陈王 谢恩章	改封陈王 谢恩章	改封陈王 谢恩章	改封陈王 谢恩章	改封陈王 谢恩章	改封陈王谢 恩章
封二子为 公谢恩章	封二子为 公谢恩章	封二子为 公谢恩章	封二子为 公谢恩章	封二子为 公谢恩章	封二子为 公谢恩章	封二子为公 谢恩章
初封安乡 侯表	初封安乡 侯表	阙	初封安乡 侯表	阙	初封安乡 侯表	初封安乡 侯表
谢妻改 封表	谢妻改 封表	阙	谢妻改 封表	阙	谢妻改 封表	谢妻改封表
自试表	自试表	自试表	自试表	自试表	自试表	请招降江 东表
谢赐柰表	求自试表 二首	求自试表 二首	求自试表 二首	求自试表 二首	求自试表 二首	求自试表
求自试表 二首						陈审举表
						请用贤表
	谢赐柰表	谢赐柰表	谢赐柰表	谢赐柰表	谢赐柰表	谢赐柰表

需要强调的是,上图本篇目顺序无疑是不可靠的。正如瞿镛揭示出的,上图本“卷七《班婕妤赞》在《禹妻赞》前,《汉高帝赞》在《巢父赞》前”,但是宋本诸赞排列是按时间顺序的,《汉高帝赞》应当与《汉武帝赞》等汉代帝王论赞编排在一起,共同居于周代帝王论赞之后,而不应当与巢父、务光等隐士论赞编排在一起,《班婕妤赞》同理。也就是说,上图本篇目顺序并不如后出的诸明本篇目顺序可靠。但是这并非问题的关键,上图本、明活字本、舒贞本、郭云鹏最大的区别并不是调整《谢赐柰表》与《求自试表二首》的顺序,而是上图本正文有《初封安乡侯表》《谢妻改封表》,明活字本及出于明活字本的舒贞本、胡纘宗本等等都没有其正文,仅仅有其目录。而晚于明活字本、舒贞本的郭云鹏本目录和正文却都有其文字,但是篇目顺序又与明活字本系统目录一样而与上图本不一样。因此不管是如黄永年认为的郭云鹏本“直接源出活字本”还是蔡敏敏认为的“出于活字本,并参考了舒贞本的内容”,都是不成立的,因为仅凭明活字本或明活字本与舒贞本,都是不会有《初封安乡侯表》《谢妻改封表》正文的。那么会不会是郭云鹏本在刊刻过程当中参考过上图本?笔者认为其可能性也不大,一则倘若郭云鹏见到过流传甚渺的宋本,却仅仅用上图本补充两篇缺文,而用明活字本作为底本、舒贞本作为对校本,并不合常理;再则,如黄永年等指出的是,郭云鹏本与明活字本在文字上也呈现出一致性,而与上图本不甚一致。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郭云鹏本与明活字本是同源文本或者说出于相同版本系统,尽管该系统源头已无法追溯,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并非上图本。

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四库本。从表中来看,四库本这里的篇目独树一帜,似乎与上文认为四库本出于郭云鹏本矛盾。但是,四库本篇目尽管与郭云鹏本有差异,其文字却差异不大,因为《陈审举表》和《请用贤表》就是郭云鹏本《求自试表》其二,其中《陈审举表》的篇名,《考证》明确记载是四库馆臣根据《百三家集》改定的:

《陈审举表》刊本缺“陈审举”三字,据《百三家集》补。^①

至于《请用贤表》,其文字则是郭云鹏本《求自试表》其二末尾的一段文字,四库本把它独立出来,标上《请用贤表》之名,其实也是根据《百三家集》。《百三家集》本《陈思王集》该篇小题之下明确有注文:

旧集割裂《审举表》蒙此之前,名曰《又请自试表》,今正之。^②

如前所述,今本曹植集是后人从群书当中辑佚出来的,尽管所谓《请用贤表》与《陈审举表》前后文义似乎不甚连贯,但是这两段文字合为一篇并非出于错误,而是在其来源文献《艺文类聚》当中就是连在一起,称“曹植《自试表》曰”,因此辑佚之人才将该表排在曹植著名的《求自试表》(收入《文选》)之后,题为“又”。从宋本以来迄于诸明本,无不将该篇文字视为《求自试表二首》之二。只有张燮《七十二家集》本、《百三家集》本和四库本独立出来,题为《请用贤表》。如前所述,四库本校勘过程当中大量参考过《百三家集》本,《考证》保存的十条校勘记,九条都是根据《百三家集》。因此,有理由相信与将《陈审举表》独立出来一样,四库本将《请用贤表》独立出来是根据《百三家集》本进行的调整。至于张燮《七十二家集》本,由于该本实际是《百三家集》本的蓝本,《四库全书总目》中《百三家集》提要说:“(张)溥以张氏书(按,指张燮《七十二家集》)为根柢,而取冯氏(按,指冯惟讷《古诗纪》)、梅氏(按,指梅鼎祚《文纪》)书中其人著作稍多者,排比而附益之,以成是集。”^③《七十二家集》声名不彰,但是《七十二家集》本曹植集却是第一次在十卷本系统基础上,又重新大规模根据类书、总集等文献整理曹植集,因此比宋代以来十卷本系统多出二十篇左右。上引“旧集割裂《审举表》蒙此之前,名曰《又请自试表》,今正之”其实是并非张溥的调整,而是沿袭《七十二家集》本的文字^④。鉴于《七十二家集》本大规模调整十卷本系统的事实,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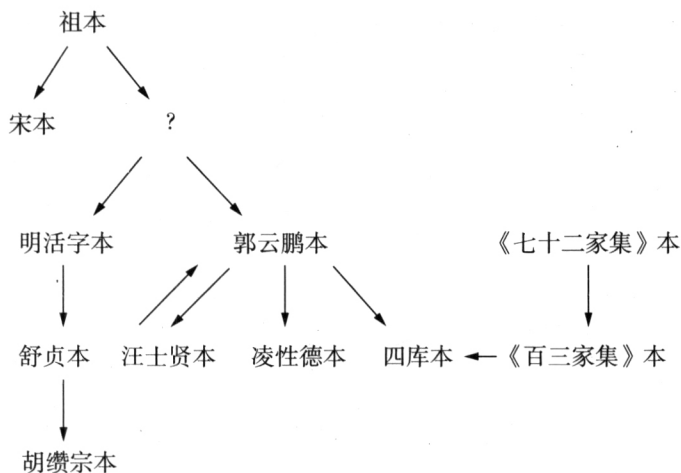
①王太岳等:《四库全书考证》卷七四,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②《陈思王集》卷八,明崇祯徐博刻《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本。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第1723页。

④《陈思王集》卷五,明刻《七十二家集》本,国家图书馆藏。

之“旧集”“今正之”的表述,有理由相信该调整是始于张燮,四库本间接地受其影响。还有一条证据也足以证明《四库》本底本原本并不是《求自试表》《陈审举表》《请用贤表》三篇文字,而是《求自试表》二首两篇文字,即前引《四库全书总目》统计《曹子建集》诗、赋之外的文字,共得“杂文九十二篇”,但是四库本诗、赋之外杂文实际共得九十三篇,相差一篇,而如果将《求自试表》等三篇文字还原成二篇,那么其数恰为九十二篇,与《四库全书总目》合。这也充分证明,四库本曾经根据《百三家集》本对底本进行过调整。倘若将上述四库本对底本的调节悉数还原,就不难发现,四库底本与郭云鹏本完全一致,而与宋本及明活字本系统不同,因此有理由相信,四库本是出于郭云鹏本。综上所述,笔者重新整理曹植集版本系统如下图:



“祖本”指宋人辑佚重编十卷本《曹子建集》祖本,该祖本至少衍生出上图本和诸明本祖本两个系统,诸明本祖本版刻年代无法确定,因此以“?”表示。诸明本祖本至少衍生出明活字本和郭云鹏本两个系统。舒贞本沿袭明活字本,卷首增田澜序;胡纘宗本沿袭舒贞本卷次;汪士贤本、凌性德本沿袭郭云鹏本释音^①,沿袭关系不难判断。值得补充的是,张燮《七十二家集》本曾经参考十卷本系统,并在此之外,另起炉灶,根据类书等文献钩沉辑佚,重新编次,形成“《七十二家集》本——《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本”一系版本系统。四库本自诩出自明翻宋“嘉定六年”本,循名责实,不过是根据郭云鹏本、参之《百三家集》本而已。

【作者简介】时鹏飞,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代文献与文学。

^①蔡敏敏:《现存明本诸曹植集概考》,第118-119页。